

# 张庚先生对戏曲文物学建设的关注与贡献

车文明

作者赐稿

—

在中国戏剧史上，张庚先生是一座不朽的丰碑。他对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载史册，与日月同辉。就戏剧、戏曲学领域而言，他在戏曲理论与戏曲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安葵先生所言，他“创造出集本世纪学术大成的成果”。[1]（P255）我们注意到，在七十年漫长的革命与学术生涯中，张庚先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接受、借鉴当时先进的思想理论，从而使他的学术理论成果具有前沿性、创新性。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衡量，张庚先生确实是一名始终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的优秀共产党员。

如前所述，张庚先生的学术成就是非常丰富的，在戏曲理论与戏曲史方面尤为突出。这里我要谈的，是他对戏曲文物学建设的关注与贡献。

戏曲文物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用廖奔先生的话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学科。[2]（p1）戏曲文物是指与戏曲相关的有价值的物质遗存。根据形态分类法，它大致可以分为戏台、戏曲雕塑、戏曲碑刻、戏画、戏曲抄刻本、舞台题记等几类。粗略归纳，其作用与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补史，也就是填补戏曲文献史料中的某些空白与不足，如剧场史、舞台艺术的形象资料、古代乡村戏曲活动情况等。其次是证史，如河南出土的大量北宋墓葬杂剧雕砖印证了文献中有关中州地区杂剧繁荣的记载，山西中南部众多的金、元戏曲文物与古籍中有关平阳地区戏曲活动之频繁的记述相一致，清代中期至民国后期遗存的大量舞台题记证明地方戏的兴盛等。第三是纠正并完善戏曲研究中某些既定看法，如由以前的戏曲起源与成因上的一元论与唯传播论到多元论的转变，对成熟的北杂剧的命名由“元杂剧”到“金元杂剧”的变化，对元末明初北杂剧衰微说的质疑等；第四是引起了研究方法 with 戏曲观念的丰富与更新，如由单纯的爬梳文献到注重田野考察、文物与文献相结合，运用文物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种方法，更强调对综合艺术的真正综合研究。同时，许多戏曲文物本身就是精美的艺术品，具有审美、欣赏、愉悦、借鉴以及美术史料等价值。

学术界对戏曲文物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戏曲学家、考古学家对某些戏曲文物，如戏曲碑刻、戏台、戏曲绘画等首次予以关注，在报刊上刊发照片，并撰文介绍，标志着戏曲文物研究的滥觞。50 年代以来，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及国家基础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大批珍贵的戏曲文物不断呈现在世人面前，更多的人加入了戏曲文物研究行列，包括一些一流学者，专业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并积极进行专门性的考察，其成果愈来愈引人注目，戏曲文物学应运而生。

张庚先生虽然没有撰写有关戏曲文物研究的专门文章，但却在其与郭汉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及时吸收、利用了新发现的戏曲文物及研究成果。该书插入了 33 幅文物图片（不包括书影），虽然这些具体工作是由刘念兹与龚和德二先生完成的，但也反映了主编的编撰思想。尤其是在他亲自撰写的第一编《戏曲的起源与形成》中，利用了宋、金、元戏剧砖雕与石刻等文物资料，论述戏曲的形成过程，并且给予戏曲文物以高度的评价：

解放以后，从地下发掘出一些古剧文物，如河南偃师宋墓演剧画像砖、山西侯马金代董墓院本演出俑、山西芮城元墓演剧石刻，都是我们研究院本造型艺术的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它们产生于不同时代（一为北宋末年，一为金大安二年即公元一二一〇年，一为元初），但可以看出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3]（p70）

后来，在主持编写《中国戏曲通论》时，张庚先生再次证引戏曲文物论述戏曲产生的原因：

在平阳地区（也就是今天山西晋中、晋南地区）留下那么多宋元时代的古建筑，特别是许多古戏台和宋金墓葬，它们给我们展示了许多生活安定、经济生活富裕的证据。[4]（p14）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现代百科全书，是一座中华文化的历史丰碑，它的编纂与出版是一项 20 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程，其意义与价值不言而喻。其中《戏曲曲艺》为一卷，“戏曲编辑委员会”由张庚先生担任主编，其中“戏曲史”部分又由张庚先生兼任主编。本卷不仅反映了当时戏曲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以其“百科全书”的权威性、经典性、学术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指导着戏曲研究的走向。该书专列“戏曲文物”一项，介绍了重要戏曲文物 15 组，刊布了 70 余幅戏曲文物图片，充分体现出戏曲文物的

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其中“戏曲剧场”一条以不短的篇幅勾勒出古代剧场之发展轨迹，并从“老式剧场”形制与“传统戏曲艺术”特征入手，阐释了二者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显示出文物与曲学相结合所产生出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标志着戏曲研究对戏曲文物的应用由单纯引介几条资料作为点缀、佐证到深入探讨戏曲内部规律的转变。《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戏曲文物的收录，标志着学术界对戏曲文物价值及相关研究成果的认可，而作为主编的张庚先生功不可没。

正是基于大量的研究成果与上述条件，刘念兹先生在 1986 年 3 月出版的《戏曲文物丛考》一书中正式宣告了“戏曲文物学的问世”。

《中国戏曲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编纂出版的多卷本戏曲专业志书。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由政府主持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各地各民族戏曲历史和现状的戏曲专业志书。志书的编纂出版，无疑是我国戏曲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其规模在世界戏剧文化史上也是空前的。志书的主编就是张庚先生。经过全国近万名戏曲工作者历时 16 年的艰苦努力，30 部省卷已于 1999 年全部出版。30 部共洋洋 3000 万言，15000 张彩色与黑白图片，记述了我国各地各民族的大小剧种 394 个、精选剧目 5318 个、介绍演出场所 1832 处、收录戏曲文物古迹 730 处、记录报刊专著 1584 种，同时为 4220 位戏曲人物列传，全面系统地记录、反映了我国戏曲文化从起源至 1982 年两千多年的产生、形成、发展、嬗变历史。其资料价值与学术成就越来越受到海内外戏剧界、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同时，编纂工作促进了各地戏曲科研机构的建立，推动了戏曲音乐学、戏曲表演学、戏曲文献学、戏曲文物学、戏曲民俗学、戏曲经济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对建立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戏剧戏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里主要谈一下对戏曲文物学建[1]设的贡献。

首先是志书明确地在《志略》中为“演出场所”与“文物古迹”立项，进一步肯定了戏曲文物的价值，确立了戏曲文物的地位。由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戏曲文物普查，将戏曲文物的考察、搜罗、统计和登录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天地。据权威部门统计，仅参加省卷编纂者就达 5000 多人，加上搜集资料的基层文化馆的干部，不会少于 50000 人，[5]（p372）如此推断，参加文物调查的人员起码在万人以上。这在戏曲文物研究史上确实是空前绝后的

举动。发现、登记的戏曲文物多达 2391 件[5]（p364）。而 1832 处演出场所也是在多出几倍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其中 80% 为古戏台（1949 年前）。众多的古戏台是戏曲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立体的、形象的剧场发展史，成为戏曲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珍贵实物资料，同时，也是雄浑壮美的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沿着当年调查人员走过的路线寻觅时发现，不少文物已经荡然无存，有的正在塌毁、消失，其中不乏进入各省志的 730 处文物古迹及 1500 余座古戏台。由此，更显示出志书及相关资料汇编所记录的文物资料价值之珍贵，也再次证明戏曲志的编纂以及全国性的戏曲文物普查是一种抢救性的研究工作。

戏曲文物的普查以及《中国戏曲志》（包括各地内部出版的“资料汇编”）的编纂，不仅给我们展示出数以千计的丰富多彩的戏曲文物，而且培养出不少戏曲文物研究的专门人才，产生出众多研究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 1931 年至 2000 年，在各类公开出版物上共发表戏曲文物研究论文 515 篇，其中 1954 年以来共 473 篇，平均每年约 10.3 篇。而 1983 年至 1996 年共 324 篇，平均每年约 24.9 篇，远远高于其它时期。而这正是《中国戏曲志》收集资料、编纂出版的主要时期。从论文作者工作单位来看，这一时期各地文化部门及其研究机构的同志占多数，而他们正是戏曲志编纂的主力。戏曲志的编纂以及戏曲文物的普查与戏曲文物研究论文数量的增加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从 1959 年至 2003 年，国内共出版戏曲文物研究专著 29 部，有 9 部得益于戏曲志的编纂与戏曲文物普查，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李近义《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傅仁杰、行乐贤主编《河东戏曲文物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杨健民《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文物出版社 1992）、周华斌《京都古戏楼》（海洋出版社 1993）、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6）、刘文峰《中国戏曲文化图典》（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寒声等主编《上党傩文化与祭祀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谢涌涛、高军《绍兴古戏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张林雨《山西戏剧图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

一个新兴学科的确立，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第二要有独立的学术范畴、学术工具以及方法论；第三要有系统的专业化的研究课题，而不是零星的分散的论题；第四，要有一定规模的，尤其是专

门的研究队伍，代表性的人物。专门的学术刊物，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其中要有标志性的成果；第五，就是学术共同体形成的一种集体的信念，包括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形成类似于库恩所说的“范式”。由此判断，戏曲文物学已基本成立，而且是戏剧戏曲学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分支学科。对戏曲文物学的建设，不少学者都做出过重大贡献，但由戏曲志的编纂所引出的上述成就对该学科的建设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这里，张庚先生作为这一宏伟工程的总设计师，功莫大焉。这样讲决不是生拉硬扯，举一例就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戏曲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因其体格卑下而不被文人士大夫所重视，主流文化长期将之拒之门外并时有摧残。历代正史《艺文志》不予著录，《四库全书》“集部”亦不收入，“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王国维语）戏曲文献资料的遗存与戏曲辉煌的历史很不相符，导致戏曲史研究中有更多的空白或模糊区域。这一问题，对乡村戏曲史而言，尤为严重。而乡村地区恰恰是古代戏曲活动范围最广、涉及人口最多的区域。对古代乡村戏曲史的研究，除了利用那些少的可怜的零星的、分散的文献资料外，主要靠人类学方法的田野调查与戏曲文物考察来获取资料。通过戏曲志的编纂以及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与文物考察，张庚先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作了题为《中国戏曲在农村的发展以及它与宗教的关系》的专门讲话，指出：

在我们写《中国戏曲通史》的时候，有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因此主要讲了通都大邑经济发达地区戏曲的情况，没有深入到穷乡僻壤广大农村。……搞戏曲志后发现农村有很多戏。戏曲产生以后，除了在城市，也在农村发展。……戏曲借宗教存活，宗教也借戏曲招徕善男信女。

在陕西做过一些调查，剧团都有一个戏路，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一年都是赶庙会，凡有庙会的地方就要演戏。在南方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敬神就要演戏，因此目连戏就借此发达。[6]（p403—405）

这不仅表明张庚先生对包括戏曲文物考察在内的田野调查的高度重视，而且也充分表现出他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胸襟广阔、与时俱进的大家风范。

参考文献：

- [1] 安葵. 张庚评传：第十一章第三节[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 [2] 车文明. 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廖奔序[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 [3] 张庚、郭汉城. 中国戏曲通史：上册[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 [4] 张庚、郭汉城. 中国戏曲通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 [5] 刘文峰. 《中国戏曲志》的资料价值、学术成就和对学科建设的影响[J]. 中华戏曲，（总 28）.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 [5] 刘文峰. 《中国戏曲志》的资料价值、学术成就和对学科建设的影响[J]. 中华戏曲（总 28）.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 [6] 张庚. 张庚文录：第 5 册[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04 年第 3 期

---

---